



陈笃彬，男，
1951年生，福建泉州人。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泉州师范学院院长。



苏黎明，男，
1957年生，福建南安人。1982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泉州师范学院教授。

泉州古代书院

陈笃彬 苏黎明 著

齊魯書社

四

明代泉州的书院

明代二百七十多年，泉州的书院历经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发展过程。明代前期一百多年，由于元末明初泉州社会一度持续动荡及明初统治阶级书院政策的影响，泉州的书院发展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进入明代中期，泉州的书院开始再度兴盛，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仅新建了大批的书院，而且许多毁废的书院也再度得到了修复。明代后期，明王朝四毁书院，使泉州的书院发展也受到了影响。同时，明代泉州的书院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明代泉州书院由衰而兴

元末明初，泉州社会持续剧烈动荡，社会生产力和文化教育受到不小破坏。明代初期统治阶级大力倡导科举，对书院未加重视，官学兴盛，使书院的发展受到抑制。自洪武至成化将近一百年间，泉州的书院一直处于沉寂的状态。进入成化以后，由于科举腐败，教育空疏，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书院发展因此出现重大转折，再度兴盛起来。

应当指出，明王朝建立后，对文化教育是重视的。朱元璋

出身贫寒，虽不知书，但却深知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早在称帝立国之前就留意文教，重用文士，关心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明王朝建立后，对人才的选取更加重视，鼓励教育的措施也更加有力。不过，明初的几代帝王都把教育的重点放在鼓励荐举、举办官学和提倡科举方面，对于书院则未加重视。明初对发展官学十分重视。早在明朝建立前三年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即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后改建在南京鸡鸣山下，称国子监。对国子监生给予优厚的待遇。永乐元年（1403年）又在北京设国子监，于是有南北监之分，待遇同样优厚。对于地方官学，明初同样很重视。洪武三年（1369年）即谕中书省臣：“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明史·选举志》）洪武八年（1375年）又下诏立社学。这种社学，兼有郡县学的预备学校的性质。明王朝还把郡县学宫修建的程度、规模的大小，作为衡量官员德政、教育重视程度的基本标志。中央政府的这种政策导向，促使泉州的地方官员都把注意力放在兴办官学方面，以此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不断修葺、扩建府县学，“前有作者，后必响之，莫敢废也”（《泉州府志·学校》）。泉州府学及各县县学在明代前期多次修建、扩建、重建，规模不断扩大，建筑也更为堂皇。典型如泉州府学，已成为“举八闽之学宫，未有若是之胜者矣”。明黄河清《泉州府学记》云：“泉州郡学甲于天下，盖极其仪尽其制，备天下之所未备。”（《泉州府志·学校》）洪承畴《泉州府学记略》云：“予温陵名邦也，理学文章，籍籍于世，而学宫实陶淑之地，人才借兹以蔚集，人文借兹以化成。”（《泉州府志·学校》）明代著名

文学家王慎中也说：“泉州儒学，其地据郡之兑方，最胜而广袤，先师之庙，明伦之堂，巍栋华宇，甲于闽中。”（《泉州府志·学校》）地方官员把注意力放于府县官学，对书院则不重视。

明代对科举的重视也抑制了书院的发展。明王朝建立后，对科举更为重视，进一步强化科举制度。洪武三年（1370年）正式下诏开科举。当时曾以天下初定，官多缺员，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举人免于会试，即可赴京听选，一时宠遇甚厚。洪武十七年（1384年）确立了三年大比的制度，并规定了详细的科举程式。明初用人，除科举外，又以荐举、监生参用。宣德（1426—1435年）之后，独重进士科，罢荐士之路，一切纲以科第，抬高进士的地位，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不成文法。明代重视科举至于如此，难怪为世人所艳羡了。后世留传的《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就是产生于明代。明代还规定地方学官任满后须经科举取额及业务考核。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颁布《学官考课法》，专以生员科举成绩作为学官政绩好坏的一个主要标准。《学官考课法》规定，学官在任职九年间，中举人数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才能达到优秀。同时还规定，学官要接受四书五经考核，如果学官在任内中举人数达到优秀，本身又通过四书五经考核，便可得到升迁；如果九年间生员中举人数很少，甚至全无者，那就是最差，学官又考不通经义者，便遭黜降处分。学官还要接受平时考核。一般是由地方官对府县学生员进行季考，由学政对生员进行岁考。如生员无长进，学官要受“罚俸”乃至“罢黜”的处分。如此，学官把注意力集中于科举，对书院漠不关心亦属不足为奇了。

明代前期，朝廷对书院不重视，直接影响到泉州地方官员对书院的态度。有一个例子颇为典型，即安海石井书院的修葺问题。石井书院在明初已“岁久倾颓”。洪武年间，晋江八都里长颜

债泰写了《请赵公重建官学文》，认为人才难得，时机易失，请求修复石井书院。他说：“其成于事业，至为建学宫修祀事，不亦人之难得乎。而兴废有常，不免荒墟，迨今百余载而莫能举而倡之者，不亦时之易失乎。”“今而官僚肃于廷，士民聚于野，儿童歌于市，父老息于家，惟恐舍我报政而去，然九重不可路扳，天恩不可期拟，亦将如之何哉。念君侯一尝按临于石井，留憩于二朱先生之祠。邦人思侯所憩无异甘棠，方将截留鞭镫，遗爱吾民，以书院复而兴之。至于智者献其谋，富者输其财，忠信者尽其心，是亦必有人焉。惟君侯重念主盟，笑而许之，非特为斯文道学之光，将使吾民沐浴君侯之泽，借道学似无穷，岂非为吾民永永之事业乎。且古云晋朝羊公一片石，龟龙剥落生莓苔。今晦庵片石已莓苔矣，愿君侯扶而立之。后之人亦将扶立君侯风教于千载之下，岂徒岷山之有片石哉。邦人惻惻惟恐时之易失也，而区区者辈，尤敢奉书纳恳，无任悚惕。冒犯威严，伏廷俟命之至。”（《安海志·学校》）尽管言辞恳切，却未能打动这位赵太守之心，修葺之事，杳无音信。难怪明佚名者在《重建石井书院疏》中大发慨叹：“迩来经残教弛，俗变风移，岿然数仞宫墙，竟作一堆瓦砾。夕阳半壁腥风，礼殿虚横秋草。满庭雨暗，讲堂孤暝。哭吾道虽无祸福报应，叹人心宁莫恻怛咨嗟。”（《安海志·学校》）由于迟迟未得响应，直至成化年间，傅凯在《重建石井书院记》中仍表示出不满：“由宋至于今，田既迷失莫究，书院为风雨所震坏，地基为豪黠所侵并，而夤缘盖屋筑坟于基内。郡庠生庄慨等白诸抚院张公，行檄未复而去。”因为“世之俗吏以是为法令所不及，不加之意”（《安海志·学校》）。傅凯在这里，实际上已指出了石井书院为何在明代前期多次请修而未果的主要原因所在。

泉山书院的遭遇又是一例。这所在南宋时期曾颇负盛名的书院，元末明初同样际遇坎坷，经元末丧乱，已一片荒凉，明初又

为晋江县学所占据。晋江县学在南宋初年尚无专设，只是附在府学东面，到了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才在府城行春门内的东仓库及附近空地独立建学。经宋元两代的修扩，逐渐完备。明洪武元年（1368年），泉州设卫指挥使司，泉州府衙被卫指挥使司据为卫衙，知府便将府衙迁至晋江县学处，把晋江县学占为府衙。于是，县学便迁至行春门外的袞绣铺，把原在这里的泉山书院改建为县学。这种由上而下的层层迫迁，可见当时书院在地方官员眼中的地位。名义上是把奉祀先贤朱熹的场所，升格为奉祀先圣孔子的场所，实际上是层层下迫。泉山书院无处迁徙，只好将朱熹像暂寄在晋江县学的明伦堂，聊作对他的尊崇，师生则散居各处讲习。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到了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御史钟道元按事泉州，视察县学宫，发现泉山书院的这种尴尬处境，感到实在不妥，当场批评说：朱文公是天下万世所遵，何况泉州是他过化之地，没有专祠奉祀，未免有失体统！教谕王敬、训导杨曜宗事后将钟道元批评的话转告县丞常守雍。大概是因为上司的训戒，于是第二年就在县学的礼殿后面草草建了一座朱子祠，配置若干间学舍，算是恢复泉山书院。虽然学有定所，祀有专祠，其规模已大不如前。明代前期地方官员对书院的漠视，由此亦可见一斑。而钟道元的那一番话，实际上所蕴含的更主要的是对儒学及其朱熹一种尊崇的表示，并不能完全理解为对书院的真正重视。

总之，明朝政府重视官学，提倡科举，无暇注意书院，儒家学者多被吸收到官学讲学，而一般士子也因官学待遇优厚，科举前程荣崇，再加上有多种途径获得仕进之机，对私人讲学的书院兴趣不大，不再热心于书院，这是造成明代前期自洪武至成化将近一百年间，泉州的书院一直处于冷寂无闻的最主要原因。

明代泉州书院在成化年间（1465—1487年）之后才渐渐兴

起，至嘉靖年间（1522—1566年）达到极盛。书院由衰转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还是由于科举腐败，教育空疏，统治阶级也逐渐意识到这些问题，因而转而扶持书院的发展，于是，一批士大夫纷纷兴复或创建书院，倡导讲学之风。

明代统治阶级大力倡导科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的腐败也日益显露，士子大多心存侥幸，不肯刻苦读书，于是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等科场作弊手段，相演成风。尤其到了成化以后，科举独重八股，八股文最终形成其严格的程式，士子只读程墨房稿。顾炎武曾批评这种现象说：“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举天下而为十八房之读。”“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日知录》卷十六）明代的官学受此影响，也逐步变成科举的附庸，府县学被视为取得应试资格的场所。府县学的教学内容依科举考试内容而定。科考是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做八股文，府县学也就以“四书”、“五经”为教材，学做八股文，教学活动愈来愈少。生员只要参加月考、季考及祭奠等活动即可，很难学到真正的学问。督学也往往玩忽职守，不尽其责，如此更助长了士习人心骛于奔趋而不务实学。

应当指出，对于府州县学教育日益形式化，官学生员一心于八股举业而不注重真实学问的弊端，当时泉州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纷纷指出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并主张通过兴复书院来加以补救。进士庄楷就是其中之一。据《泉州府志·明循绩》载：“庄楷，字世范，号慎庵，晋江人，金事琛子。天顺壬午岁（1462年）贡试第一，卒業南雍。成化丙戌（1466年）入粟六百石需次天官。陈泉州宿弊六事曰：兴复书院，以兴教化；禁取牡蛎以固桥梁；守令题

名以示劝惩；修刊郡志以存典故；除毁窝寨以消贼名；分置恶疾以祛民患。皆有补于时政，多见采纳。”庄楷所痛陈的泉州宿弊六事，其第一弊即是郡县官学未能起到应有的“教化”作用，而对策亦很明确：“兴复书院”。这一对策亦为泉州的地方官员们所采纳，因为尽管入明以来，官府全力扶持府县学，根本不重视书院的存在，以为可以官学取代书院，然而结果并未能如愿，官学质量每况愈下，无法满足统治阶级培养所需人才的需要。于是，地方官员也开始改变对书院的态度，转而采取倡导与扶持的政策，带头捐俸，发动士绅、生员兴建、修葺书院，为书院添置教学设备，购买学田作为师生生活经费或劳师奖学基金。经常到书院视察讲学，慰勉师生。地方官员扶持书院的要义所在，诚如晋江县令黄昌遇在《重修晋江县一峰书院碑记》所云：“夫既立之学于府州县矣，而复立书院者何？盖学以课其文，而书院以课其业。业非徒课试文章之谓，将以之通经学古，循习乎礼乐刑政之大，研精夫性命之微，以为国家之用，后学之师，故书院之重其于学也。顾其地不幽静，院不宽廓，先无以驻足之地，何以群萃而精勤？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欲望人材之兴难矣。”（《泉州府志·学校》）话已说得很清楚：府县学已成为主要学习八股文章以应科举的地方，而书院则是真正钻研学问的地方，在这里可以通经学古，真正学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因而这是为国家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比府县学更为重要。这位县令虽然生活在清乾隆年间，然而他所表达的思想也正是明代中叶以后泉州地方官员对书院的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看法。

由于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出题做八股文，官学以朱熹所注的“四书”及“五经”为法定教材，士子“只读程墨房稿”，因此，科举腐败，官学沦为科举附庸，士子学不到真正的学问，导致南宋末年以来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在明代中叶遇到

了挑战，这就是王阳明“心学”的出现。王阳明认为程朱之学“言之太深，析之太精”，结果“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造成“记诵词章”的恶习，他认为“若求圣人之道，惟在心中自得”（《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他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就是继承陆九渊的学说发展而成的，它是同程朱理学不同的另一个理学派别，被称为“心学”或“陆王之学”。由于当时的科举和官学都以程朱理学为宗，王阳明为摆脱程朱理学的控制，必须别辟讲学之所，发展自己的思想和学说，于是到处设书院讲学，宣传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唯心主义学说，救治人心的“陷溺”，“破心中贼”。王阳明的学说被称为“王学”，他的学生被称为“王门弟子”。“王学”是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王阳明宣传他的学说，推动了书院的复兴，而书院的复兴又为王阳明学说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阵地。借助书院这个阵地，王阳明拥有了一大批弟子，主要生活在嘉靖年间，遍布于全国各地。这些弟子在王阳明死后也纷纷建立书院，宣扬王阳明的学说。由于“王学”的影响很大，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王阳明及其弟子借助书院传播其学说，就这一做法本身而言，对明代中叶以后泉州书院的兴盛同样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王阳明及其弟子在各地大办书院播扬“王学”的同时，泉州也有相当一批朱子理学信徒受其影响，积极倡导兴复书院，包括一些或在学术上颇有造诣，或在仕途中颇有作为，或者两者兼具的在当时影响很大的知名人士，如张岳、蔡清、王慎中、何乔远、林希元、陈琛等等。这些人身份不同，经历不同，政治价值取向及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在创办书院传播朱子理学这一问题上，他们的思想却是一致的。这些朱子信徒所以积极倡办书院，其动机之一与王阳明及其弟子是一致的，这就是看到官学的形式化及科举出现的弊端，于是试图另辟蹊径，通过兴办书院讲

学,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但是,他们与王阳明学派不同,即并不认为当时官学与科举问题的根源出于程朱理学。在他们看来,程朱学说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必须尊崇和播扬的,问题只是出在对这一学说的理解、表述与应用,表现出的误解与偏颇。因此,他们所以也积极倡办书院,并非为了否定朱子学说,恰恰相反,是为了维护朱熹的“正学”地位,借助书院这一阵地,进一步阐明朱熹的“义理”要义,弘扬朱子学说,使朱子学说为更多的人所理解与掌握,巩固朱子学说在泉州的独尊地位,抵制和排斥“王学”的影响。实际上,这是他们倡办书院的更重要动机。所以,如果说这批朱子信徒积极推动书院的发展与王阳明及其弟子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最大的关系就是他们深受王阳明学派的启发:广泛创建书院,以此为阵地,传播本学派的思想,排斥“异端”学术思想的侵入。一言以蔽之,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些著名的朱子信徒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岳与何乔远,两人对当时泉州书院的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张岳(1492—1552年)字维乔,号净峰,惠安人,生于先业素薄的仕宦世家,二十五岁时,登正德十一年(1516)进士,历任广东廉州、琼州,广西源州、柳州知府十多年,曾为总兵总督湖广川滇,后官至右都御史,太子少保。为官时文治武功,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平生著述甚丰,有《圣学正传》、《载道集》、《古文汇选》、《古文典要》、《小山类稿》等等。张岳自幼好读书且善读书,尤精于程朱理学,“好学究极程朱,以大儒自期”。他“学宗程朱”,以倡明圣学为终身志愿,决心继承程朱的思想。王阳明学说兴起后,张岳不以为然,曾当面与王阳明论辩三日。王阳明利用书院传播自己的学说,张岳也积极倡办书院。泉州一峰书院创建后,他继王宣担任书院山长,既为掌教又亲自讲学。明代中后期,对泉州书院的发展影响较大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泉州史学家、《闽书》作

者何乔远。何乔远,号匪莪,又号镜山。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布政使、户部和工部右侍郎等职。由于他刚直不阿,持正敢言,因此遭权贵排挤,居家归里近三十年。“其出而当官,则与士大夫言政;其归而闭户,则与门弟子论学”。其著作颇丰,除力作《闽书》外,尚有《狱记》、《西征集》、《名山藏》、《万历后集》、《天训集》等。何乔远尊尚程朱理学,早在万历四年(1576年)任建阳教谕时,为倡明理学,即匾其堂曰“宗朱却贄”。万历十四年他的那篇进士试卷《吾岂若使》中,进一步显露这一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敢于“发人所能道,亦人所不能道”,即拿尧“使”舜,舜“使”尧,来论证朱子“一德之交,则君使臣,臣能使君”的互补关系,精辟入微。他辞官归来后,倡议移建泉州朱子祠,并在城东门外镜山结庐讲学达二十多年。初名“祉躬社”,后改名休山书院。他不仅自创书院讲学,还到泉山书院讲学。他所以亲自创办书院并在书院讲学,既有对当时朝政的不满,也是为了借此弘扬朱熹学说,宣扬理学道德。由于张岳、何乔远等人既是朝廷的重要官员,又是有名的学者,他们积极倡办书院并讲学其中,对明代泉州书院的兴盛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直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

明代泉州新建书院热潮

明代成化以后,沉寂了近百年的泉州书院又开始喧嚣起来,在府县学教育功能逐显缺失的情况下,书院代之而起。同时,由于受张岳、何乔远等名儒讲学和兴办书院的影响,泉州各地出现了兴办书院的热潮,并在嘉靖年间达到了最高潮。根据《泉州府志》、各县县志及其他一些地方志记载,明代泉州共新建了二十所书院。

表三:明代泉州新建书院一览表

书院名称	院址	建立年代	创建纪要
一峰书院	府治	嘉靖八年 (1529年)	巡按御史聂豹、福建提学副使郭持平、泉州知府顾可久等建,纪念罗伦
欧阳书院	府治	成化十八年 (1482年)	运判张庸建,纪念欧阳詹
新山书院	府治	嘉靖元年 (1522年)	泉州进士顾珀建
休山书院	府治	万历年间 (1573—1620年)	泉州进士何乔远建
巢云书院	府治	隆庆三年 (1569年)	知府朱炳如建
南塘书院	晋江	嘉靖八年 (1529年)	晋江县令钱榷建,祀朱熹
鳌水书院	晋江	成化元年 (1465年)	不详
龙泉书院	晋江	正德年间 (1506—1521年)	洪天馨建
凤山书院	安溪	嘉靖二年 (1523年)	安溪知县龚颖建,祀朱熹
紫阳书院	安溪	嘉靖年间 (1522—1566年)	提学副使邵锐建,祀朱熹
养正书院	安溪	嘉靖三十年 (1556年)	安溪知县王渐造建,祀朱熹
丁溪书院	安溪	景泰五年 (1454年)	安溪知县李清建
文公书院	永春	嘉靖三年 (1524年)	永春知县柴鏞建,祀朱熹

(续)

紫阳书院	德化	嘉靖七年 (1528年)	德化知县许仁建,祀朱熹
丁溪书院	德化	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	德化知县绪东山建,祀朱熹
龙浔书院	德化	嘉靖四十年 (1561年)	德化知县张大纲建
五桂堂 书院	南安	嘉靖年间 (1522—1566年)	傅阳明建
孔泉书院	南安	明末	潘鲁泉建
文发书院	惠安	崇祯年间 (1628—1644年)	惠安知县赵玉成建
鳌江书院	同安	嘉靖年间 (1522—1566年)	总兵戚继光视师时建

1. 一峰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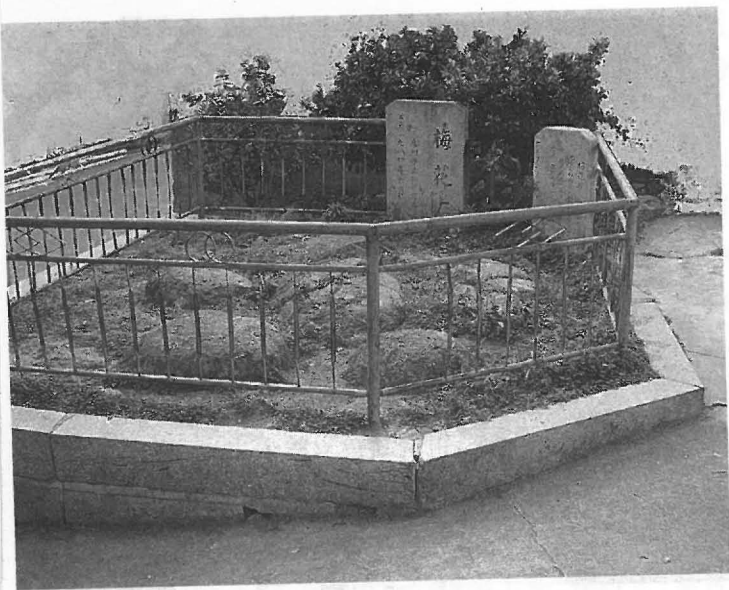
一峰书院是明代泉州新建书院中最为著名的一所书院。该书院位于泉州府治东北的执节坊梅花石古迹东侧,是为纪念罗伦(一峰)而创建的一所书院。罗伦(1431—1478年),号一峰,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明成化二年(1466年)参加殿试时,对策万余言,直斥时弊,名震京师,登进士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之职。罗伦为人刚正廉明,抗直敢言,不避权贵,因面斥和疏劾大学士李贤“丁忧”期间破例任职一事,触犯了朝廷,于成化五年(1469年)被贬为专管海关外贸事务的泉州提举市舶使。其时泉州海交商贸已逐渐衰落,不久市舶司即迁往福州,罗伦空有其职,又厌恶官场腐败,于是便栖居泉州城北梅花石东畔的道教真净观里,聚集生徒,锐意讲学,一时间向他求学者络

绎不绝，就连府县学的教谕，也率领生员前来受教，聆听讲学，受益非浅。罗伦一时名声大震。李贤死后，罗伦得到商辂保荐，被召回南京任职，未及两年便弃官还乡，结庐讲学至卒。罗伦泉州讲学，经常勉励生徒要做个正直的人，勤奋学习对国家和百姓有用的学问。因此，他虽离开泉州，但他的高风亮节和渊博学识却为当时及后来的泉州人一直所景仰。明嘉靖八年（1529年）春，福建提学副使郭持平巡视泉州，提出罗伦曾“谪居于是地，而尸祝之典未举”，建议建祠纪念。这一提议得到泉州知府顾可久，晋江知县钱榘、通判李文、推官徐炤等人的一致赞同，于是商议将罗伦讲学之所净真观改建为书院，并申报于巡按御史聂豹，得到支持。于是，“斥支去昏淫之鬼，因旧材稍易，悉以坚良”，然后奉罗伦先生神主于其中，依时祭奠。接着又在一峰先生祠的前后辟出土地，建讲堂、斋舍、厨房等，共计四十多间房。“择士之有志者居之”，延聘乡绅进士王宣、张岳等，先后掌教书院。知府顾可久和县令钱榘经常涉足书院，并为书院解决经费问题，使之“讲求益备，而书院之传可以久而不衰”。二十多年后，因为风吹雨蚀，书院“日倾月圯”。而且，因为有风水先生指出书院之地乃风水宝地，导致“覬觐者众”书院受到侵迫。时值胡文宗同知泉州，目睹了书院的状况，颇为不满。他在《重修一峰书院记》中说聂豹、郭持平“行部至郡，据礼协议，相与崇重，式成兹役，以风士类，实获我心。余忍坐视其然，亦司存之耻也”。于是，倡议重修书院，要使一峰先生祠与郡邑中的“真西山祠”及“王梅溪祠”一样，“世世专祀”，“有永无数”，发扬光大。他带头捐俸，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把整个书院翻修一遍，“不以烦公帑劳民力，自堂序以达门墙治之则已”（《泉州府志·学校》）。陈琛曾有诗赞曰：“牛山须禁放牛羊，藏久良弓要力张。远大也应甘澹泊，元微亦只在平常。悟来



图四 一峰书院明代石额

始信无名语，老去方知有故乡。敬起一峰吾敢问，定行白水答清浆。”在地方官员与乡绅的重视下，一峰书院学风日盛，士子人数不断增多。当时，学宪朱镇山公事办完，常来书院讲学。知府、县令也有多人在书院讲学，加上掌教书院的王宣、张岳都是当时的名儒，所以书院声誉鹊起，名噪一时。一峰书院创建时，树有大石匾额“一峰书院”，后来“院”字失落，仅剩“一峰书”三字，人们因之称其地为一峰书，这个地名直沿袭至今。一峰书院在梅石古迹处，又有“梅石开，状元来”的谶语。久而久之，一峰书院竟有梅石书院之别称，实则是同一个书院，并非两处书院。



图五 一峰书院的梅花石

2. 欧阳书院

欧阳书院又称清源欧阳书室，院址在泉州府城东北清源山五台峰右侧之虎岩，是为纪念欧阳詹而建。该地原为唐代泉州名士欧阳詹及林蕴、林藻兄弟的读书之所，景色清幽，但因年代久远，书室早已荒废，仅留有石室如瓦窑，又有可濡墨之石，石上大书曰“石砚”。元释大圭曾有题咏。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运判张庸等感念欧阳詹及林蕴兄弟等对泉州文教的影响，于是捐集资金于原址重建欧阳书室，并立祠堂祭祀欧阳詹，祠堂旁筑房舍数间，吸引四处士子学者，让他们在此研学栖息。嘉靖八年（1529年），欧阳詹的裔孙欧阳深及欧阳深之子欧阳模重修。欧阳模字宏甫，号八山，嘉靖三十七年举进士，官云南参政。欧阳深及欧阳模因事业发达，且深恐先祖遗址泯灭，于是奋起重建欧

阳书室，捐出资金，伐木陶土，拓地鼎新，考究方位，“以完其美”。拓地重建后的欧阳书室，称欧阳书院，其规模比成化年间所建的书室扩大了不小，也较为堂皇壮观。据明代陈让所撰的镂于书院读书堂西面石上的《欧阳书室记》云：新建的欧阳书院“中为欧阳子读书室，西辟小轩，南北其户，任风月云烟以来往。东巨石，拔山而横出者二，如承露仙掌。浮以飞亭，望沧溟而临千里。南俯泉城，如碎盘觞豆，罗列几下。午夜书声可以相闻。紫峰在座，浸以晋江，若可架长虹，研珠而濡墨焉。此则欧阳书室之大观也。轩之西矮屋数间，辟东牖以迎朝曦。牖东石如崖门，由以入北室，奥然小区，可以居休观妙。室右巨石如立蛙，前仰后俯。俚以入，可坐数十人，固栖元之秘关也。”（陈国仕《丰州集稿·记》）书院建成后，李开芳书“高山仰止”刻于岩前。明代泉州第一个进士黄凤翔为其撰了一幅对联，刻石嵌于壁，曰：“文章道德开先，万古云霞成豹隐；载籍音容在望，一龛烟火似蜃囊。”黄凤翔还赋题一诗赞誉曰：“秋风似选读书声，遗迹灵岩结构成。甲第当年龙虎榜，湖山千古薜萝情。朝看野色连云起，夜落灯花带月明。为有孙支传世业，青苔那许锁柴荆。”何乔远、黄克晦等也皆有题咏。这所书院，由于建筑颇具规模，规制较为完备，有祠堂，有讲堂，有斋舍，又位于泉州风景名胜之地清源山南麓，风光旖旎，加上书院本为泉州先儒欧阳詹的读书之处，而且书院又一直存续到清代，因此颇具吸引力。书院建成后，一时之间，曾经吸引了相当一些学者聚集其中。也正因如此，《泉州府志》及一些泉人学者曾把此书院列为泉州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可见其影响是比较大的。

3. 新山书院

新山书院又称清源新山书院，是为纪念明代泉州进士顾

珀而建，院址在泉州城北清源山泰嘉岩。顾珀，字戴祥，号新山，晋江人，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和州太守、南吏部考功司郎中、湖广布政参议、湖广按察副使、四川按察副使、河南右参政、江西左布政使、南太仆寺卿、南户部右侍郎等职。顾珀为人正直，守礼循义，为官清正廉明，颇有政绩，是明代泉州名宦之一。顾珀未登科第前，曾隐居读书于清源山泰嘉岩，并与山灵相约：“他日能有寸进，当使斯岩其中兴乎？”意即今后倘若个人仕途发达，决不会忘记这个泰嘉岩，将使它扬名。后来，顾珀果然登第当官，他没有忘记当初的诺言。嘉靖元年（1522年）顾珀回到家乡，恐泰嘉岩遭到意外破坏，即急于实践诺言。于是，捐出官俸，购买材料，雇佣民工，认真规划设计，于泰嘉岩上修葺殿宇五间，构廊八间，东西轩六间，内门一座，浴室一所。嘉靖十四年（1535年）复建堂五间，匾曰“新山旧隐”，外门一座，庖厨一所，绕以周垣，成为“清源胜概之最”。（顾珀《清源新山书院记》）至此，新山书院已颇具规模。时隔三十一年后的嘉靖四十五年，书院因年久欠修，逐渐颓败。这时，泉州知府万庆目睹书院衰落的情况，感顾新山的为人及宦绩，倡议重修书院，并带头捐俸，募集了一笔资金，对书院进行全面修葺，使之面貌焕然一新。这所书院一度也颇为著名，但明末毁废。

4. 休山书院

休山书院又名清源镜山书院，院址在泉州清源山赐恩岩下南麓后茂村，何乔远建。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何乔远仕途受挫，借辞请假归故里，长期居家，不赴职上。这期间，他曾与杨文恪、陈及卿、李世贞、山人黄克晦等结社，称为“温陵五子”，共同探究理学，赋诗撰文。他又在后茂村建“祉躬

社”，率诸门集讲。“祉躬社”有“土覆瓦三间五楹，左连一间”，实际上已具书院性质。何乔远曾题联座右曰：“人心中无私便圣天理内外事最乐。”接着又购买民房数间为学舍，并改“祉躬社”为休山书院。后又对书院加以进一步扩建，建了“自誓斋”、“天听阁”等，使书院具有相当规模。明代苏琰作《镜山书院记》云：“山房周围，荔枝百树，杂卉千名。径以西为亭，即乔远著书处，北有自誓斋，东有土室，中为草堂，三间五楹，左连一间为茶灶，斋之后为‘天听阁’，阁中两壁绘作名贤小像。斋之背有石镜，石镜东有衣乐亭。”周边多摩崖石刻，有何乔远为宋宰相李邴隐居处题的“醉月岩”、“石境”、“不厌”，谢修之题的“石廩”，大学士叶向高访镜山书院记事题刻等。（《泉州市志·古建筑》）。该书院因所在地位于清源山，又有镜石，何乔远自号镜山，书院因此亦称镜山书院或清源镜山书院。该书院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讲学很自由，任学者士子往来，“无峻壁之限，无干彻之约，有慕而至者，有休（休息）而至者，有因游而至者，不惊新客，不问主人”（苏琰《镜山书院记》）。无论来的人出于何种动机，书院一概予以接纳，表现出其雍容大度。何乔远亲自在书院讲学前后达二十多年，由于对其学识才华、道德修养的仰慕，加上书院的开放性，因此到书院来向他求教或与他切磋的人络绎不绝。所谓“慕镜山而思造门者踵相接”，正是很好的写照。史载：“凡士人入温陵而不能得其一言一字者，以为辱”，更是这所书院在当时颇具魅力的高度概括。甚至泉州以外的不少人也慕名而来。例如，明代宰相福清人叶向高“慕其为人”，又钦佩他的“治学精神”，曾偕同南安洪有声、晋江黄国鼎、郭梦詹等名士，到休山书院拜访何乔远，与其讲学论道。何乔远亲自创办书院并长期在书院讲学，诲人不倦，为家乡造就不少人才。因此，休山书院亦曾名噪一时。

5. 巢云书院

巢云书院在清源山巢云岩，原为明代泉州名宦詹仰庇辞官归隐的读书之室。詹仰庇，字汝钦，号咫亭，安溪人，徙居郡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初授南海令，因“才贍守廉，除盗雪枉，创条鞭法”，政绩卓著而被提升为御史。任御史期间，刚直敢言，多次触怒皇帝。明穆宗四处搜求宝石珍玩，廷臣疏谏不听，詹仰庇再次上疏，引经据典，力谏此乃“丧德丧志”之举，请求停止；陈皇后出居别室，致忧郁成疾，詹仰庇上疏此事不妥，结果皇帝手批：“妄言！姑不究。”内臣假上供名，恣意渔猎，詹仰庇上疏请求核查，“勿作无益以害有益”，结果再次触怒龙颜，廷杖削籍。明神宗即位后，起任广东、江西参议，转山东按察副使、南京太仆少卿、左佥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迁刑部侍郎，以身体有病辞官归家，二十多年后卒，年七十一。“赐祭葬，赠刑部尚书，特祀学宫。”詹仰庇归隐期间，在清源山巢云岩设书院，读书著述，以为自娱，并以巢云书院为书室之名。明隆庆三年（1569年），朱炳如知泉州，为詹仰庇的气节所感动，于是募集资金，购材雇工，以詹仰庇的书室为基础，建起了巢云书院，招揽生徒，礼聘儒师，讲学于其中。明黄思近《游清源巢云岩》诗云：“谁构禅尼此一阿，逍遥从昔羨詹何。亭流曲水堪环座，石老盘松可倚歌。和郢客来芳草碧，闭关人定白云多。只欲岩际觅真隐，何事沧州制芟荷。”（《丰州集稿·诗》）但这所书院在存在了一段时间后就废弃了。

6. 南塘书院

南塘书院在石狮龟湖象畔塘旁，也是明代嘉靖年间由地方官在晋江所建的一所书院。嘉靖八年（1529年），晋江县令钱榭废龟湖五通庙，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所书院，称为南塘书院。该

书院建筑规制亦较完备，中有崇正堂，祀朱熹像。两旁分别设有一讲堂称“正俗堂”及“兴教堂”，崇正堂堂侧有两廊，各建有号舍五间，并配有厨房、浴室等设施，延聘名师聚生徒讲学其中。该书院于明末毁废。

7. 鳌水书院

鳌水书院是明代晋江县较早设立的一所书院，位于晋江县南永宁镇，俗称文祠。明成化元年（1465年）设卫学，吸收军生六十名入学，后卫学与民学合并，成为书院。该书院一直存续到清代，但在明代的具体活动内容不详。

8. 龙泉书院

龙泉书院在晋江华表山草庵殿内，又称“草庵精舍”。华表山因两峰并立如华表而得名，山上有著名的摩尼教草庵。草庵寺右约五十步，有巨石如船，上刻两个各一尺见方的大字“龙泉”。书院以此取名。书院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创办人为晋江儒士洪天馨，号薇峰，自署稜陵洞通衢道人，系一位道德学问著于当时的名儒。据史乘记载，他生而多病，三岁还不能说话。长大学《易》，攻举子业，傍及群书，尤专心医药卜筮之术。后往来于清源山、天心洞、金粟洞、灵源庵，所到之处即景踏咏。尝游杭州、南京。曾多次赴试，均以懊丧而归，岁及中年时，妻子和儿女又不幸相继去世。科场失意，家庭变故，使洪天馨再也无心过问功名，遂隐居华表山，构筑草庵精舍，专志授徒讲学。据传明代嘉靖年间有十八位硕儒曾读书于此，一时美名馨芳，传播远近，亦为后世所传颂。弘一法师挂锡泉南时，特地为此书院题“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史乘记载于此有明贤读书”的对联一副，这副木刻对联，至今仍挂在草庵殿内石刻摩尼光佛的两边。

9. 凤山书院

凤山书院又称考亭书院或朱文公书院，院址在安溪县治西的凤山。凤山乃安溪名胜之地，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时，因公到安溪，曾登临县治西面里许的凤山通元峰凤泡庵，吟咏诗篇，题于壁上，留下“过化”之迹。安溪人景仰朱熹，注意保护这“过化”之迹。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龚颖知安溪县时，“锐精图治，百废俱兴，岁辛巳以修县志，稽其详”。在主持修县志时，龚颖听说朱熹有诗题于凤泡庵壁，即带了邹鲁等僚属“诣庵登眺”，一见果然如此，慨然有感，对邹鲁等人说：“斯山斯水，其吾道文明之胜概乎！吾当祛左道，植名教，俾我文公之神化不徒想象于无像也。”在他看来，这里作为朱子“过化”之处，释佛香火缭绕，而竟然没有一处祭祀朱子的地方，委实有辱“过化”之功。因而提议把凤泡庵迁徙他处，以其址建一书院，供祀朱熹。这一倡议得到众僚属的赞同，于是凤泡庵被迁移。龚颖又募资鸠材，就其庵改建为朱文公书院。“堂隳门廊之类，辟其旧而增新之，肖像于堂中，易颜于户外，焕然耸瞻。凡四方士子之经临，无不下车而稽顙也。既而祀典宜崇神栖宜洁，复请于监察御史王公，以旅岁举常祀，二以崇报功之意。金门子一，以供洒扫之役。而以仪门规制，于是乎悉备矣。”（《泉州府志·学校》）书院因地在凤山，亦名凤山书院。这所书院是明代安溪著名的一所书院。久废。

10. 紫阳书院

紫阳书院在安溪县学宫东。明代嘉靖年间，提学副使邵锐倡建，得到响应。监生吴辉捐地，安溪知县黄恽主持修建。书院内祀朱熹，并以朱熹仕泉州的两位门人，即宋代安溪县尹陈宓、

县主簿陈淳配享。后因其地改建为文庙，书院遂无遗迹。

11. 养正书院

养正书院在安溪县治。明嘉靖三十年（1556年），安溪知县王渐造就启圣祠前建文公祠，祠前为书院，中为正堂讲所，翼以四房，前庭东西两廊列房各五间。嘉靖三十九年（1565年），倭寇侵扰安溪县城，书院遭毁。

12. 丁溪书院

丁溪书院在安溪县学前溪上。明景泰五年（1454年），知县李清建，为往来缙绅讲学憩寓之所。后废。

13. 文公书院

文公书院在永春十四都留湾，为明代永春著名的一所书院，知县柴镗建。柴镗是明代永春一位颇有政绩的知县，浙江临海人，举人，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知永春，“明狱平赋，迁学宫，修邑志，毁淫祠，为社学”。明嘉靖三年（1524年），主持修建文公书院，请陈琛为之作记。陈琛的《文公书院记》云：“永春大尹临海柴侯镗，新建朱文公祠堂。成以书来告曰：‘镗无似，颇有志于古学，而未之能。来吏兹土已四年余，幸寇靖人和，乃率诸生顾瞻庙学，栋宇将就颓，议徙建于白马山之原。而吾朱文公过化永春，宜有专祠。去县治三里许，地名留湾，山环水绕，郁有佳气。前尹毁淫祠，贷其地于民，以充公费。今赎之，建祠以祀。经始于嘉靖四年腊闰之望，落成于五年季春之吉。敢请记。’”（《永春州志·学校》）书院中为中正堂，祀朱子，后为讲堂，两翼建二楼，左曰识风楼，右曰同月楼。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入侵永春，书院被毁。后续建于县治东北隅。

14. 紫阳书院

紫阳书院在德化县治西，嘉靖年间德化知县许仁建。许仁为浙江仁和人，知德化县时勤谨为政，重视教化，“毁淫祠，创社学，设学租，筑射圃，复教场，焚坛遗，浚丁溪，修春波楼，缮廨署，建名宦乡贤祠，置漏泽园、养济院，善政累累不胜书”（《德化县志·宦迹》）。创建紫阳书院，就是许仁知德化四年间兴学重教的一个较为突出的表现，他把位于县治西上市的天妃宫改建为供祀朱子的紫阳书院，延师聚徒讲学其中。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广西马平举人绪东山任德化知县，对书院加以修葺和扩建。明代郑普的《丁溪书院记》云：“德化实温陵西鄙之地。嘉靖丁未春，天官三南绪公来宰是邑。公之为政也，肃廉惠和而不倦，故未久而人阜功济。于是葺紫阳书院，构驾云亭，渐复古义社，卓卓然欲以天下国家之志，尽施于一邑也。”（《德化县志·学校》）这所书院直到清代乾隆初年才毁废。

15. 丁溪书院

丁溪书院在德化县治南丁溪西岸，山川坛之左。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知县绪东山建。绪东山也是明代德化一位重视兴学教化的知县。《德化县志·宦迹》云：“绪东山，号三南，广西马平人。嘉靖二十六年，以举人来任。嗜学，工诗文，讼清政简，公庭无事，日与诸生讲论。建丁溪书院，俾习业其中，置学田贍之。构架云亭，复古义社。邑士民祠于龙浚山之麓。”据郑普的《丁溪书院记》载：德化县治南有丁溪，因溪纵横似丁字故名。“一夕雷雨，水决，溪形见，当时叶咏曰：‘地脉曰丁，流溪之应甚明矣。’嗣是则荒芜堙淤，比之残梗卑湫而已，恶足钟淑气而发清材哉？绪公深明其理，于是拨其泥而导其脉，披其蓊，使列献

呈高，众流会深，从而辟以书堂斋房数十，斋居学者，堂则时讲习焉。”绪东山任德化知县，在修葺扩建紫阳书院的同时，又在丁溪畔创建了这所书院。从上述郑普的记载可以看出，丁溪书院当时的规模是比较大的，既有讲堂，还有斋舍数十间，“又置学田，为廩膳资”。绪东山还“将郡多士而亲教之”。德化士民后在龙浚山建祠供祀他，正因为他对明代德化文教的兴盛起过颇为突出的作用。这所书院亦是直到清乾隆初年才毁废。

16. 龙浚书院

龙浚书院在德化县龙浚山麓，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德化知县张大纲建。《德化县志·宦迹》云：“张大纲，字立卿，号衢坡，广东龙川人。嘉靖三十八年来任。前令张景武筑城新就，虑其低薄辽阔，即改缩增高。适永春贼吕尚四合徒万余，流劫攻城。纲身亲督战，擒斩无遗。自是上杭、永福诸盗，不取犯境。尤惠爱百姓，作兴人文，创建书院于龙浚山之麓。”据此可见，这所书院是在张大纲知德化县的第三年创建的。清乾隆初书院毁废，址犹存。

17. 五桂堂书院

五桂堂书院在南安丰州桃源，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建，傅阳明讲学处。傅阳明，字际熙，号晦吾，南安丰州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举人。初授广东从化教谕，任职期间，积极发展当地文教，修文庙，治祭器，悯贫怜才，作《葩经通解》以教士。后提升为南陵县令，整顿吏治，节省开支，减轻杂税，“治狱称平”。不久，以病辞官告归，当地士民相率挽留，“有称其日知月明者，有称其五刑五用者，有称其宽平鲠介者，有称其淳朴智慧者，有称其里中节缩者，有称其狱诉平允者。而归志已决，率莫

能挽”(《泉州府志·明循绩》)。由此可见,傅阳明为官时间虽不长,然却颇有政绩,也博得当地的很高赞誉。傅阳明辞官回家后,即在原来自己的读书处设书院讲学授徒,称为五桂堂书院。自此过着恬淡的乡野生活,“惟与同志聚会谈古今”,终其生以读书讲学自娱。

18. 孔泉书院

孔泉书院在南安罗东厚阳,明末南安罗东人潘鲁泉建,该书院曾在明末清初出过五个举人,故以“一院出五举”而驰名。

19. 文发书院

文发书院在惠安县治,又称关圣庙,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惠安知县赵玉成建,“与诸生讲学其中,堂塑关圣帝像”。这所书院最为突出的特色就在于其所供祀的圣象是关羽,故又称关圣庙。据(《惠安县志·坛庙寺观》)载,书院当时就有:“学使郭公之奇所匾也。初祭关圣,皆于丁日祭,至雍正五年(1727年)命以戊日祭,用太宰。”另据《惠安县志·名宦》载:“赵玉成,江南吴江进士。崇祯十六年(1643年)任。捐金建文发书院,朔望集绅士讲学其中,择诸生能文者月课艺两期,品其高下,经赏拔多联编者。当是时,民不知法禁之苦,而士翕然有诗书之乐。以异绩擢铨部,邑人勒石思之。”

20. 鳌江书院

鳌江书院在同安,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建,创办人为戚继光。据载,嘉靖年间,倭寇作乱沿海,戚继光担任总兵剿灭倭寇。他在视师同安时创建了鳌江书院,作为授徒讲学之所。但书院的具体情况不详。

从上述可以看出,明代泉州新建的二十所书院,大部分是在嘉靖年间及嘉靖以后创建的。其中嘉靖前的成化年间创办的四所,嘉靖年间创办的有十二所,嘉靖以后创办的有四所。而能够确定为成化年间以前创办的书院,仅有安溪的丁溪书院一所,而且这所书院在景泰五年(1454年)创办时,还不是很严格意义上的书院。可见,明代泉州新建的书院大多数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即成化以后,并在嘉靖年间达到高潮,而在成化年间以前则很少,这与明代福建和全国其他地方书院发展的轨迹基本是一致的。

明代泉州续修的书院

明代中期以后,泉州各地在创办大批新书院的同时,对宋元时代所建的一些书院,也开始进行或重建或修葺或扩建,有的书院甚至还进行过多次的修葺和扩建,尤其是南宋所建的几所著名的书院,在明代中叶以后都进行了程度不一的续修。

1. 石井书院

南宋享誉一时的晋江安海石井书院,到了元代一度遭遇毁废,变为一片荒墟。据明傅凯的《重建石井书院记》云:“田既迷失莫究,书院为风雨所震坏,地基为豪黠所侵并,而龛盖屋筑坟于基内。”(《安海志·学校》)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乡官颜债泰曾上书恳请泉州赵太守予以修葺:“盖闻难得者人也,易失者时也。难易之间,得失甚远。然则何谓难得?夫至尊者道,至贵者德,道德有于其人,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此其人之至难得也。何谓易失?道德蕴于身,或不行于时,而不垂于后,此其时之易失也。是以君子进德修业,欲其及时。窃谓自太极肇判,